

# 极端经济：危机中的契机

■本报记者 袁一雪

10月12日，经济学家 Paul R. Milgrom 和 Robert B. Wilson 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这两位“从小处着手”的经济学家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

以微观机制影响宏观变革，是疫情之下经济学家为经济发展提供的新思路。因为疫情，也让世人对于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经济面临一场突如其来又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是经济韧性。

事实上，经济的韧性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具潜力，微小之处也能展现出经济的生机勃勃。今年9月上市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以下简称《极端经济》）一书中，就描述了世界九大地区在极端条件下经济顽强发展的案例。

## 经济的韧性

在亚齐特别行政区首府班达亚齐，人们还保留着对2004年那场可怕海啸的记忆。在兰普克海滩经营餐馆的苏尔扬迪在那一刻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骑着摩托车沿着狭窄的乡村小路飞驰而去。身后的海浪像飞机一样追赶着他。

海啸摧毁了亚齐的一切，但苏尔扬迪却没有接受从海岸搬迁的建议，依然在兰普克海滩经营餐馆。而为了帮助当地人重建，亚齐花费了67亿元，同时接受国际援助。援助机构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当地对砖块、混凝土等物资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就业也让当地出现了经济繁荣，但同时加快了当地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从2004年的5%左右升至2005年的20%。

有意思的是，当援助机构在2008年从亚齐撤出后，工作岗位缩减、经济支出降低，但并没有让亚齐的GDP大幅下降，反而持续增长。所有新的生产和收入、支出从何而来？

# 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高数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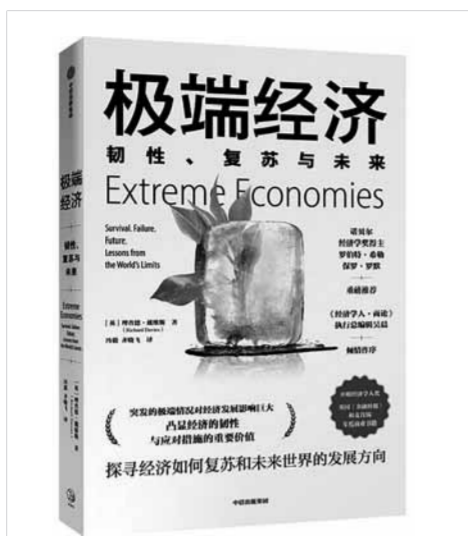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等数学”课程是高校理工科学生入校后第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理工科学生刚入高校后，最先遇到的难学课程之一，更是学生最容易挂科的课程之一。如何走进高等数学的世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如何学好高等数学？遇到难题怎么求解？……众多学习路上的“拦路虎”摆在大学新生面前，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难题？这是本书作者叶志明推出《我的高数笔记》一书的初衷。

翻开这一页页字迹工整、条理清晰的数学笔记，仿佛与年轻时的叶志明对话，又回到了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叶志明在镇江农机学院（现江苏大学）求学的专业是汽车专业，大学毕业后在材料力学教研室工作，曾因恢复高考后高数教师紧缺而兼任高数助教近两年。从求学到工作，他阅读了国内外很多高数教程，同时习解了国内各类高数习解集（4000多题）、理工科学生的习解课与难题答疑，以及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几年各高校工科专业研究生高数考试卷题目等1万余题。利用1979年暑假的几个星期，他撰写了学习心得与解法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叶志明曾在1980年江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中获得全校第一名，高数几近满分。带着这份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来他成为上海大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高数是一门“古老”的基础学科，其教材内容的更新换代并不似应用学科那般快速，因此，若干年前的笔记对今人的学习依旧有现实意义。不少院士大家在学习中留下了笔记手稿，然而，它们更经常的去处不是走近



《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英] 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出版，定价：69.00元

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战场边缘，扎塔里建立了收容难民的难民营。当逐渐摆脱战争的威胁，不再只关注健康、安全等最基本的需求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了迷你版的“企业”，例如剪掉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木质大篷车侧面，建造小售货亭，之后，杂货店、烟草店甚至婚纱出租店和迎合青少年的台球厅也陆续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该难民营实现了65%的就业。

在美国最大的监狱路易斯安那，监狱中的严苛要求也没有阻止那里地下经济的发展。以物易物，以贸易为生，渐渐兴旺起来。

《极端经济》的译者、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冯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道，亚齐、扎塔里和路易斯安那监狱的事例都体现出经济的韧性。“今年2月接到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我国的疫情刚刚开

青年学子，而是深锁于高校校史馆或档案馆。

在江苏大学举办的“如何讲好一堂课”专家报告会暨《我的高数笔记》新书发布会上，叶志明认为，把高数笔记留在校史馆或档案馆，它只是一件“展品”，他更希望高数笔记是一件“用品”，“展品往往只有少数人欣赏，而用品却是大多数人在用”。

本书涉及非数学类的各类本科专业学习的全部高数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完整的高数学习指导与参考书。书的全部内容以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级数、微分方程、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场论与集合论初步等类别进行分类编著。

与目前市场上的高数题解集等明显不同的是，该书更多地展示了作者的亲身解题经历，并将很多集中涉及概念、定理、方法、应用等技巧的习题编入其中，还列入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解法心得。例如，在《我的高数笔记》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原来几乎全部是不变量的学习逐步过渡到对变量的学习，也就是用变的思维来对待高数学习。

同时，本书还是历史的见证。字里行间还有当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试用但最终未采纳的简化汉字，但并不影响阅读。

鉴于内容众多，本书以“资料性著作”的形式出版，全部手稿影印转化为电子出版物，最终全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纸质版+电子版”，其中的纸质版就像上学时随身携带的“小薄本”，并不会给读者带来搬运上的负担。



《我的高数笔记》，叶志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定价：38.8元

始。翻译过程中，也是疫情阻击战最为关键的时刻。我意识到这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其中描述的很多经济现象，对疫情之下的经济恢复，以及最近提到的‘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正如书中所举的例子，极端条件下，经济会以另外的形式生长而出。“远程办公、网络会议、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甚至是小区自发组织的团购生活用品、食物等，都是疫情之下人们行为的变化，也正在影响着宏观经济结构的走向。”冯毅说，“只要人们愿意去做，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每个人的自我创造都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点滴动力。”

##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除了亚齐、扎塔里和路易斯安那，《极端经济》的作者、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还走访了另外六处极端经济体，并将这九个地点的经济发展状况归为三类。

其中前文提到的三个地方代表经济生存的韧性；而偷渡、走私、抢劫兴盛的无人区达里恩、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和工业革命起源之地格拉斯哥，却都曾经拥有巨大的自然、人类和工业的潜力，但是由于经营不善，都被浪费了；位于日本北部的秋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却让读者看到了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作者眼中，秋田是老龄化的前沿，塔林是科技的前沿，圣地亚哥则是不平等的前沿。事实上，现在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的威胁，同时，智能机器人也将影响更多的工作场所，而且，圣地亚哥式的经济不平等将变得更加普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2030年将是这三类城市的混合体：一个老龄化、先进技术和经济不平等共存的城市社会。

理查德·戴维斯曾谈到，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来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知道看向哪里，我们今天就能瞥见未来。其诀窍是找出一项持续的趋势，以及大多数人都在遵循的道路，并观

察那些经历过这种极端趋势的人的生活。”凯恩斯把那些生活在塑造经济趋势的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锋队”。这是思考未来经济的有用方式，因为他们正在为其余的人窥探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全球视野、引经据典，也让翻译工作变得更为艰难。为了让读者更容易产生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冯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也询问了在所书中所提到的城市的朋友，以期让场景描述更准确。“翻译的过程中，最有心得的是与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关的圣地亚哥章节，我对该学派的理论知识比较熟悉，但书中提到其在圣地亚哥的实践，让我对于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冯毅说，“同时，达里恩案例中提到公共选择理论，我对该理论的提出者很熟悉，同样也知其理论，而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提到的案例是纯理论研究都无法涉及到的内容，案例的分析也让我对理论理解更深入。”

## 思考当下与未来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 原副总裁朱民在读完《极端经济》后感而发：“理查德·戴维斯从他考察的这些人面临的极端场景中，提出了视角崭新的经济发展的韧性问题，引人深思，值得一读。当前全球突发的疫情凸显了极端环境下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性，作者提出的生存和重建路径的建议对于世界构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疫情虽然让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纵观历史，黑天鹅事件并不鲜见，全球经济依然蓬勃发展。“经济学家很多在做理论推演，但实际上真实的案例更能启发人和教育人。这本书十分应景，但我认为，更深层面的经济复苏不仅针对疫情带来的影响，而且对我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要求。”冯毅说，“如果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我相信拥有巨大市场和资源丰富的中国，经济肯定能进一步发展起来。”

# 托尔斯泰：进入中国的百余年

■本报记者 温新红



1910年10月末，列夫·托尔斯泰从家出走，途中生病，11月20日在阿斯塔沃沃车站逝世。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托尔斯泰就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文学性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现代作家，比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汉等。

回顾托尔斯泰进入中国的百余年历程，翻译家草婴有着特殊的分量。10月25日，在托尔斯泰逝世110年和草婴逝世5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世界文学云端：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读书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作家赵丽宏、孙甘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畅谈了托尔斯泰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他在中国的知音草婴。

## 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大概在1900年前后，托尔斯泰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不过，徐振亚说那些都是介绍性的，很少有作品的翻译。

他说，最早起到桥梁和引导的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学者、翻译家辜鸿铭，他通过上海领事馆和托尔斯泰联系，写信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译他的书。另一个是留学生张庆桐，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表示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到中国。托尔斯泰都给他们回了信。从目前的所有资料看，和托尔斯泰有过书信往来的中国人只有他们两人。

孙甘露提到，苏俄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他表示，就像俄罗斯另一位著名作家莱蒙托夫写的《当代英雄》书名一样，俄罗斯作家关注同时代人以及所处时代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振荡、变化，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丰富的历史，这恰恰是文学向苏俄文学，尤其向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转向的原因。

赵丽宏和周立民都认为，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仅看到现实的生活，也看到一个思想家对人性非常深刻的思考。吸引中国那一代作家更多的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而且，托尔斯泰思想的价值并不局限在19、20世纪。

托尔斯泰对巴金的影响很大。周立民特别提到，1984年巴金作为世界笔会的七位特邀荣誉客人之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的世界笔会。会上，巴金的发言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美的、好的，凡是使人类分裂的东西都是丑的、恶的。”周立民解释说，这句话很浅白，但今天我们重新构想人类世界

的时候，仍然能够感觉到托尔斯泰这句话的力量。

## “中国知音”草婴

2019年是《战争与和平》问世150周年和《复活》问世120周年。今年9月，草婴翻译的三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精装纪念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没有草婴，中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译介是不完整的。徐振亚表示，正是草婴“为中国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辉煌的俄罗斯文学的平坦桥梁”。

会上，孙甘露也表示，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跟那一代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做了卓越的工作。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人们熟悉的话出自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草婴的翻译则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赵丽宏表示，两个版本的翻译都很好，但是相比之下，草婴翻译得很准确，读起来也琅琅上口。

其中原因，和周扬从英译本翻译、草婴从俄文翻译有关，俄文中这句话在文体上是对称的、工整的，词组的数量是一致的，所以草婴在译文中体现出这种对称以及精炼的语言。

著名俄文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曾说：“我读草婴先生的翻译，感觉就像是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文。”

从1977年起，草婴开始酝酿翻译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的宏伟计划。历经二十载春秋，草婴终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从俄语直接翻译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的巨大工程，这套“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有400多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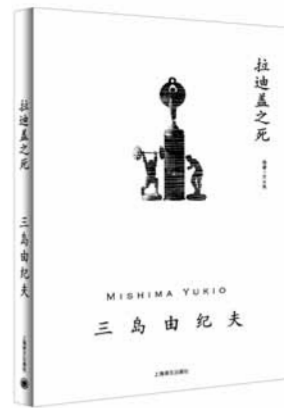
无疑，在托尔斯泰的作品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过程中，草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草婴精通俄语，也精通英语。巴金关心并支持草婴的托尔斯泰翻译工作，把自己的藏书借给草婴参考，草婴在翻译俄语原著的同时，也参考了世界公认的英译本。

上世纪60年代，草婴开始从翻译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入手。而在翻译之前，他就对作家其人做了充分研究，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

2003年，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为草婴庆祝八十寿辰。总领事柯富安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桥梁……我们相信，尊贵的中国读者也一定会注视这两个朴素却又意义深远的汉字——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了解。”

## 荐书



《拉迪盖之死》[日]三岛由纪夫著，兰立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0月，定价：65元

本书收录了三岛由纪夫17至31岁期间13篇短篇上乘之作。

开篇《水中月》完稿时，三岛年仅17岁。《山羊头》通过描绘男人在战争前后与不同女人交往时能否看见山羊头的转变，来反映主人公内心细微而急剧的变化。标题之作《拉迪盖之死》中，写的是三岛少年时期就敬仰的天才作家拉迪盖，年仅20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剖折了他内心的动荡与不安，从侧面揭示了三岛自身的心理变迁。

全书篇目行文风格多样，故事类型各异。从中可以领略作者少年时期挡不住的才情及成熟期时自我表达的老到，也可以体会其自始至终对于精神与肉体、现实与艺术的不懈探索。



《致亲爱的二老》[法]列维·斯特劳斯著，刘亚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定价：69元

2009年10月，100岁的法国“百科全书”人物、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去世。他被称为“法国国宝”、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本书收录了他1931年到1942年间写给父母的两百多封家书，标题出自他几乎每封信的抬头“亲爱的二老”。这家家书集由他遗孀编辑整理，记录了她人生中动荡、艰难但也至为重要的10年。

这10年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军营里服役；在结婚后定居蒙德马索，并在城里的高中谋得一份教职；他又乘船前往巴西，在美洲留下了研究和探索的足迹；他还曾流亡纽约，在这里与美国人类学界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在信中，他向父母表达过自己对物质生活的担忧，讲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戏剧，分享拥有相机后的各种体验，也分享自己关于人类学的论文发表后的喜悦。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德]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著，李丹丹、谢娟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定价：98.80元

欧洲“中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德国学者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着眼于历史结构，将历史人物形象与时代大势结合起来，呈现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教会生活、宗教生活、艺术以及古典文化和理性精神的复兴历程。

从法兰克人的崛起开始，弗里德里希用不同人的经历来展开关键性的主题，这些人包括教宗、国王、学者、传教士或商人。借此，弗里德里希叙述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一千年的历史、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科学发展。如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欧洲政治、文化和宗教革新；查理四世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布拉格宫廷的文化事业；还有英法百年战争和圣女贞德的故事。作者也考察了更宽广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从教宗权、教会大分裂的冲击，到君主制的新理论、法学，再到学术和科学的兴起。



《浪漫的“中国艺术”》[瑞典]喜仁龙等著，曹一鸣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出版，定价：88元

喜仁龙（1879—1966）是瑞典艺术史学家、汉学家、哲学博士、芬兰科学院院士，1920年起六次来华，曾在末代皇帝溥仪陪同下拍摄故宫，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

本书由喜仁龙、毕安祺、劳伦斯·比尼恩、霍布森、乔治·弗雷德里克·昆茨、本杰明·马尔智等众多名家合著，分11篇介绍了中国古代艺术，包括绘画、陶瓷、雕塑、建筑、玉器、石刻、漆器、青铜器、珐琅、纺织品、铁艺。上述撰稿者或是西方重量级艺术史家、学者，正是他们的研究和文字掀起了20世纪西方对中国艺术研究及收藏的热潮。（喜平）